

梁启超视界中的《孟子字义疏证》

丁成际,余建军

(安徽大学 政治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孟子字义疏证》是戴震的主要哲学著作,涵盖戴震的主要哲学思想。梁启超对中国学术思想深有研究,而他对戴震的评价可谓极高,这与他看重《孟子字义疏证》不无关系。因而,从梁启超视界这个维度来论述《孟子字义疏证》,不失为一个新颖的视点。从总体上来讲,梁启超对《孟子字义疏证》的评论符合实际,较为中肯。

关键词:梁启超;《疏证》;戴震哲学;欲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6-0042-04

梁启超对戴震的评价极高,而这与他看重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以下非引文,则简称《疏证》)直接相关。他说:“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为清代第一流著述,但其目的不专在释《孟子》,别于戴氏学专篇论之。”^{[1]17}这一则肯定戴震的《疏证》是清代第一流的学术著作,一则认为它有别于戴震考据学。这个别于“戴氏学”的地方,就是戴震据此有所创发,欲借此建立自己的哲学。而“专篇论之”一事,梁启超果真作了《戴东原哲学》予以专门论述。戴震的《疏证》能得到梁启超这位风云人物如此青睐,那么他视界中的《疏证》究竟如何呢?

一、《疏证》目的阐述

梁启超关于戴震作《疏证》目的的阐述,主要表现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他认为戴震作《疏证》目的有二:一则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哲学,一则解宋儒以佛老混淆儒学、以天理禁闭人欲之两蔽。关于前者,梁启超说:“《孟子字义疏证》,盖轶出考证学范围之外,欲建立一‘戴氏哲学’矣。”^{[2]38}那么戴震有没

有欲建立自己哲学的目的呢?回答是肯定的。戴震说:“当是时,群共称孟子好辩矣。……盖言之谬,非终于言也,将转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于事,害于政。……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对古圣人贤人而自负其学,对天下后世之仁人而自远于仁也。吾用是惧,述《孟子字义疏证》三卷。”^{[3]2}这说明戴震确实欲建立自己的哲学,而且是抱着上对先圣先贤下对后世仁人的态度。戴震作《疏证》的另一个目的,当与他程朱理学的批驳相关。戴震批评宋儒说:“舍圣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说为圣人所言,是诬圣;借其语以饰吾之说,以求取信,是欺学者也。诬圣欺学者,程朱之贤不为也。盖其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是故失之。凡习于先人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觉。”^{[4]23-24}这是对程朱理学夹杂老释之说的批驳。程朱以“理”禁人欲思想,也是戴震批驳的对象。他说:“朱子亦屡言‘人欲所蔽’,皆以为无欲则无蔽,非《中庸》‘虽愚必明’之道也。有生而愚者,虽无欲,亦愚也。”^{[4]49}戴震认为朱熹对“欲”的界定不可取,认为“欲”理当符合人之情性,对“欲”持肯定态度,肯定“情欲”的合理性,并指

收稿日期:2009-03-30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07-08D27);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项目“科学文化学研究”(09ZXD010)

作者简介:丁成际(1975-),安徽枞阳人,安徽大学政治学系、安徽大学科学发展观中心教师,中国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余建军(1979-),湖南辰溪人,安徽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道家与中国哲学。

出禁欲的危害性。要之,梁启超对戴震作《疏证》目的的阐述,可谓戴震之知己,深识戴震之意。

二、《疏证》哲学内容论述

梁启超没有专门作文论述《疏证》的哲学内容,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基于《疏证》,认为戴震的哲学是“情感哲学”。不过他曾专门作《戴东原哲学》,而《疏证》是戴震的主要哲学著作,因此可以依据《戴东原哲学》来看梁启超对《疏证》哲学内容的论述。他在《戴东原哲学》中将戴震哲学内容概述为几个方面:客观的理义、情欲主义、性的一元、命定与自由意志、宇宙观和修养与实践观。

梁启超认为戴震哲学内容之一便是客观的理义,而且戴震在阐述自己这一哲学内容时结合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程朱认为理“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19]梁启超说:“东原以为这样讲‘理’只能谓之‘意见’而不能谓之理。”^[19]的确如梁启超所言,戴震认为程朱理学所谓的“理”并非真正的“理”,实则是“意见”。为了辨明自己的“理”不同于宋儒之“理”,在《疏证》一开始,戴震便给他的“理”下了一个定义。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不紊,谓之条理。”^[19]梁启超说:“依这话,‘理’是要从客观的事物看出的。”^[19]梁启超所言不假,戴震的“理”就是客观事物之理,而非宋儒主观臆想的所谓“天理”。对宋儒的这个“天理”,戴震驳斥为“意见”。他说:“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今使人任其意见,则谬;使人自求其情,则得。”^[19]要之,正如梁启超所言,戴震反对程朱之“理”,斥之为“意见”,而认为真正的理在客观事物之中。

梁启超认为戴震哲学内容之二是情欲主义。这样的论述有失偏颇。戴震反对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提出解放人之情欲,这是事实,但是这不等于要以情欲为至上原则,因而不能说戴震哲学就是情欲主义或情感哲学。戴震说:“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明乎欲不可无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其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促,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

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19]可见,戴震肯定情欲,从而证明情欲的合理性,认为情欲不与人性相悖,而非提倡情欲主义。因此,梁启超认为戴震哲学内容之二为情欲主义,实乃一个失误的论断。

梁启超认为戴震哲学内容之三为性的一元论。他说,宋儒所说“性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可以叫做“性的二元论”。^[19]梁启超认为戴震主张性一元论,而且是和孟子一样提倡性善论。他说:“东原是个主张性善说的人。”^[19]戴震说:“是孟子矢口言之,无非血气心知之性。孟子言性,曷尝自岐为二哉!二之者,宋儒也。”^[19]他又说:“孟子不曰‘性无有不善’,而曰‘人无有不善’。性者,飞潜动植之通名;性善者,论人之性也。”^[19]可见,的确如梁启超所言,戴震是赞同孟子性善论的性一元论者,而且强调孟子言性善乃专指人性而论。

梁启超认为戴震哲学内容之四为命定和自由意志。他说:“命定与自由意志,是哲学上很重要的问题,这两件事像是绝对不相容。东原是两说都主张而令他矛盾。”^[19]什么是命呢?戴震说:“据其限于所分而言谓之命。”^[19]戴震承认存在天命,就此而言,他没有超越自孔子而下的儒家先贤的藩篱,但是他有所突破和创发的地方则表现为对人的主观意志即梁启超所言的“自由意志”的充分肯定。戴震说:“君子不藉口于性以逞其欲,不藉口于命之限之而不尽其材。……不谓性非不谓之性,不谓命非不谓之命。”^[19]可见,戴震认为有命定之说,但又应“不谓命”。何为不谓命?就是说发挥人的主观意志,在天命的范围之内,尽最大的努力施展才能。这尽管没有突破天命观的范导,却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对此,梁启超之诠释可谓确解。他说:“不能因为分限不如人,就不复求知,所以说‘不谓命’——不藉口于分限。虽有性而不藉口于性以抹煞命,是承认命定说,叫人安心在遗传环境下做分内事;虽有命而不藉口于命以抹煞性,是承认自由意志说,叫人常常向上一步实践道德责任。这便是东原的意思。”^[19]要之,正如梁启超所言,戴震既肯定天命的存在,又充分肯定人的主观意志。

梁启超认为戴震哲学内容之五为宇宙观。可惜,对此,梁启超在其《东原哲学》中标注为“暂阙”,没有予以论述。梁启超说:“我是为时候不够,赶不及做,容将来再补成。”^[19]然而,更加可惜的是,他后来大概也没有予以论述了。不过,他指出《疏证》解释“天道条”含有戴震宇宙观思想。^[19]戴震说:“道,

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121]这无疑便是戴震宇宙观。故而，梁启超认为戴震在《疏证》中阐发了他的宇宙观，乃言之有据。

梁启超认为戴震哲学内容之六是对人生修养与实践的阐述。这其实就是戴震的修养观和实践观。梁启超认为，戴震对“宋儒讲的主静立极格物穷理种种方法”，“不以为然”，^[124]总结戴震关于修养和实践的方法为两个，即“去私”和“解蔽”。^[125]戴震说：“私生于欲之失。”^[126]因而戴震认为“欲之失为私，不为蔽”。^[127]戴震“去私”的办法，梁启超认为便是“‘以我之情絮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同上疏证卷下叶三（此为梁启超原注，以小于正文字号书写，下同），这就叫做‘强恕’。能恕，私自然会去。结果叫‘不私，即其欲皆仁也’卷下叶三”。^[128]和“去私”相比较，梁启超认为戴震更加重视“解蔽”，认为“去蔽是东原的修养第一义”。^[129]的确如此，戴震有言：“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130]那么“蔽”来源何处？戴震认为“蔽生于知之失”。^[131]那么何谓“蔽”？戴震说：“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而不明。”^[132]梁启超对此评论说：“东原所谓蔽者，莫过于不顾客观的事情，而专凭主观的意见。”^[133]此说符合戴震哲学之旨。关于如何“解蔽”，戴震说：“解蔽莫如学。”^[134]怎样学呢？梁启超说：“他说：‘最要体会孟子‘条理’二字。得其条理，由和而分，由分而合，则无不可为’年谱叶四十五。拿现在话讲，即专从客观的虚心研究事物条理，综合一番又分析一番，分析一番又综合一番便是。不独如此，他还说：‘明理者明其区分也，精义精其裁断也。’疏证卷上叶三综合分析明其区分的工夫，是偏重客观方面，还要精其裁断，便是看主观的判断力如何。不过这样裁断与区分工夫并行，自然和纯粹主观的意见有别了。”^[135]梁启超的论述，可谓精当。

三、《疏证》评价

梁启超对戴震《疏证》的评价非常高。他在《戴东原先生传》中说：“先生之学，体大思精。《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书名号和顿号，笔者加，原无）两书，语极简而义极丰，殆于一字一金。”^[136]于此，来看梁启超究竟如何评价《疏证》。

首先，梁启超对《疏证》学术属性的评价。他说：“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为清代第一流著述，但其目的不专在释《孟子》，别于戴氏学专篇论之。”^[137]

这说明，一则梁启超认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是清代第一流的学术著作；一则认为它有别于戴震的考据学，不是仅仅停留在注释《孟子》文本本身这个层面，而是戴震据此有所创发，而这个创发就是戴震欲借此建立自己的哲学。这正如梁启超所说：“《孟子字义疏证》，盖轶出考证学范围之外，欲建立一‘戴氏哲学’矣。”^[138]事实上，也正如梁启超所言，戴震的《疏证》要在阐发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从而构建他自己的哲学体系。要之，梁启超认为，戴震的《疏证》是清代第一流的著述，且是哲学著作，这样的评价可谓确凿。

其次，梁启超对《疏证》所体现的戴震治学精神的评价。他认为戴震的治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他的研究方法上，称其方法为“求真求是”。梁启超说：“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139]这里会引起争议的地方，便是“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这句评语。如果就“求真求是精神”而言，早在汉代河间献王就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因而不可谓“最有价值之奇书”；梁启超大概是从它别于其他考据学家之学术著作维度立论。果真如此，梁启超还是所言有据的。

再次，梁启超对《疏证》学术地位的评价。其评价主要表现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价有些过高，恐怕最易引发争议。他对戴震《疏证》学术地位的评价，是将之置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而且充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又从横向上将之与西方文艺复兴思潮作比较。他说：“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心，为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所束缚，痛苦无已，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以尽。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阔室之‘希腊的情感主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以进行，则蓬勃而莫能御。戴震盖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两千年一大翻案。”^[140]从主观上来讲，戴震是否如梁启超所言，“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已经很难确定，不过考察当时社会与时代背景，戴震的《疏证》确实扮演了这种角色。梁启超的评价易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将戴震的《疏证》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作横向比较，而且认为二者同质同功。就同质

而言,质疑者可能不多;但说到同功,说它真“可称两千年一大翻案”,则的确有拔高之嫌而易招质疑。这是其一。其二,梁启超认为《疏证》还体现了戴震主张“平等”的精神,并予以了高度评价。他说:“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20]这样的评价是否中肯呢?不妨看看那段文字。其文为:“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40]尽管戴震之时还没有像后来梁启超之时那样盛行平等思想,但是这段文字确实表现出了戴震对尊卑、贵贱二者地位不平等的不满,因而说它体现了戴震的平等精神,大概没有失之偏颇。不过说它有伦理学上的重大革命意义,大概也有拔高之嫌。

最后,梁启超对《疏证》影响的评价。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对《疏证》反响不大不无慨叹,并简要分析了《疏证》反响不大的原因。他认为《疏证》影响不大的原因有三。一是认为戴震弟子对《疏证》已经持论相左,而倡说者的力量显得相对较小;二是当时“多数人”认为戴震著《疏证》只是为了“欲讳其不知义理”,“以诋程朱”;三是反对者也不多,这从反面也反映了《疏证》在当时没有能够产生相当的影响。此外,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实则还揭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即当时的学术主流是考据学,而戴震的《疏证》则是倡说一种“主义”,可谓不合时宜。对此,他说:“然而论清学正统之运动,遂不得不将此书除外。吾常言:‘清代学派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此其收获所以不逮“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丰大也欤?’”^[21]尽管如此,梁启超仍然对《疏证》的价值充满信心 and 期望。他

说:“岂其反响当在今日以后耶?”^[21]正如梁启超所言,后来人们反对封建思想尤其是封建礼教,确实从戴震《疏证》中吸取了不少思想。

要之,梁启超对《疏证》的评价极高,其评价甚至超越了学术范围。总体而言,其评价较为中肯得当,但也难免有失偏颇之处。

总而言之,在梁启超看来,戴震《疏证》非常重要,是他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因而也是他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一文中,梁启超说:“宋明以来之主观的理智哲学,到清初而发生大反动。但东原以前大师,所做的不过破坏工夫,却未能有所新建设。到东原才提出自己独重情感主义,卓然成一家言。他这项工作,并不为当时人所重视。但我们觉得他的话是在世界哲学史上有价值的,最少也应该和朱晦翁、王阳明平分位置。所以东原可以说是我们‘哲学界的革命建设家’。”^[22-23]客观而论,就哲学体系的完善性和精深程度而言,戴震还是难比朱熹、王阳明,但是就哲学思想之价值而言,则戴震大概并不在朱熹、王阳明之下。因而,作为戴震哲学的代表著作《疏证》,纵使放到哲学史的长廊中而论,也当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环节。

参考文献:

-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 [3](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序[M]/(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
- [4](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5]梁启超.冰室合集第五册:饮冰室文集之四十[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6](清)戴震.原善卷下[M]/(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

责任编辑:高 煊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Mencius in Liang Qichao's Eyes

Ding Chengji, Yu Jianju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230009,

Chin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hui University, Hefei230039, China)

Abstra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Mencius is the main philosophical work by Dai Zhen covering his main philosophical thinking. Liang Qichao was an expert in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 and he spoke highly of Dai Zhen mainly because he valu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Mencius. Therefore, it's a novel viewpoint to discuss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Mencius in Liang Qichao's eyes. Generally speaking, Liang Qichao's comment 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Menciu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ality and to the point.

Key words: Liang Qichao;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Mencius; Dai Zhen's philosophy; Desire

梁启超视界中的《孟子字义疏证》

作者: [丁成际](#), [余建军](#), [Ding Chengji](#), [Yu Jianjun](#)

作者单位: [丁成际, Ding Chengji \(安徽大学, 政治学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余建军, Yu Jianjun \(安徽大学, 哲学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9, 11(6)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6条)

1.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996
2.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儒家哲学](#) 2004
3. 戴震 [孟子字义疏证序](#) 2008
4. (清)戴震 [孟子字义疏证](#) 2008
5. 梁启超 [冰室合集第五册: 饮冰室文集之四十](#) 2003
6. 戴震 [原善卷下](#) 2008

相似文献(2条)

1. 学位论文 [王智忠 《诸子平议》训诂研究](#) 2006

《诸子平议》是一部训诂和校勘的笔记体学术专著, 作者俞樾(1821-1907), 晚清小学大家。他读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诸书, 好之, 遂有治经意, 而作《诸子平议》、《群经平议》。正如梁启超所言:“甫南私淑石厓父子, 刻意模仿, 但他并非蹈袭, 乃应用王家的方法, 补所未及。”但学术界尚无专门文章探讨此书的功过优劣, 这与俞樾的学术地位是不相称的。

本文拟从训诂角度, 通过《诸子平议》一书, 力求对俞樾小学学术成就和不足加以全面、中肯的分析。内容涉及《诸子平议》的训诂方法包括文字、音韵、文法等; 《诸子平议》训诂方法在校勘上的应用; 《诸子平议》的误例分析。

2. 学位论文 [刘斌 民国《论语》学研究](#) 2008

作为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经学分支,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迅速转型、传统文化面临慧命赓续和现代转换的民国时期, 承接清代学术而来的民国《论语》学, 因为时代环境的缘由和学术文化的演进, 在大批新旧学人的耕耘下, 又有了自身的新发展, 取得了许多新成绩。也暴露了一些新问题。

尽管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 民国以后还废止了小学读经, 整体上兵事不断、战火连连, 但公私藏书机构还是收藏有不少《论语》类的珍本, 而且坊间流通的《论语》文本也还很多。此间的文献著录, 在分类方法上多承《明史·艺文志》将《论语》归入“四书”类中, 其后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受日本相关分类方法的影响, 《学》《庸》《论》《孟》乃各居一属与“四书总义”类并列著录。内容来看, 清代《论语》学作品的著录特多, 若《清史稿·艺文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均是其例, 惟有清代文献特盛, 兼之或成书仓促、或组织不力, 漏载也还很多。而外, 对辑佚类作品的重视和著录, 成为此间著录内容上的另一个特点, 是亦辑佚之学在清代达到顶点、收获极丰的应有的回应。版本方面, 同整个社会技术和文化事业的进步相关, 此间《论语》类文献著录开始出现影印本、报刊本一类新本, 且与清代以来丛书大行的文化史实相对应, 著录丛书极多。再从《学》《庸》《论》《孟》的著录数量来看, 仍以《论语》类为最多, 此当与前此四书传承中《论语》学特盛的文化背景有关; 历史地来看, 著录所及《论语》学作品, 特别是清人著作, 恰也构成了《论语》学在民国时期继续前行的厚重积淀和逻辑起点。

同著录工作所反映的民国时期《论语》类文献的藏养情况有关, 这一时期的文献刊刻, 新作而外, 以清代著作的刻印数量为最多, 其中刘宝楠《论语正义》最受推重, 其次焦循的《论语通释》也刻印多次。清代以前作品的出版集中在如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韩李《论语笔解》、朱熹《论语集注》等经典注本上面。新作刻印方面有两点需要特别提及, 一是敦煌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和写本《论语集解》残卷的影印出版, 在此一时期的《论语》学界堪称一件盛事, 给民国的《论语》学带来了新鲜气息, 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是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开展, 白话《论语》读本颇为流行, 仅张兆珩、沈元超编撰的《白话论语读本》自1928~1947的20年间就由广益书局先后出版了五次, 另外民初白话文刚刚开始时江希张所著《四书白话解说》也是影响巨大、十分重要的本子。就出版单位来看, 此间刊印《论语》类文献最多的要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大出版系统, 两者刊印的《论语》类文献版种占民国时期总数的五分之三左右。而外, 随着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变动, 文献刊刻随着时间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起伏, 其中由于民族危机、尊孔读经以及新生活运动等因素的综合推动, 以1930年代开初至抗日战争打响后的1938年一段出版最为兴盛。在晚清今文学疑经之风的启发和引导下, 民国时期文献辨伪工作十分兴盛, 流风所及自然也包括了《论语》。《论语》虽非伪书, 但中古以来人们颇怀疑其中不少文句非是原有而是窜入, 某些篇章也有其向阙, 是即所谓《论语》辨伪。前代而言, 辨伪工作, 包括《论语》, 至清人崔述达至空前高度, 民国时期的《论语》辨伪实际崔述工作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具体而言, 我们认为同民国古典研究的自然分野相关, 此一时期的《论语》辨伪天然地划分为经学和史学两大阵营, 经学阵营大体又包括古文学、今文学和宋学三系, 史学流派中, 有同经学联系紧密但治学能持以史家态度者, 若梁启超、钱穆、周子同, 有典型的“古史辨”派学者, 若钱玄同、顾颉刚、董书业、赵贞信, 还有代表唯物史观派的杜任之等。同辨伪工作类似, 民国时期的《论语》校勘工作事实上也是清人《论语》校勘工作基础上的继续, 此由张国淦《论语异文表》在承接阮元、叶德辉《论语》校勘工作基础上的继续努力可以看出。

当然, 同上述相较, 最能体现和反映此间《论语》学成就的还在大量《论语》类专著、特别是经典文本的编撰。

简朝亮积十年之力撰成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是此间古文学《论语》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该书在对《论语集注》进行文字训诂的同时, 复考信证实、借为发挥, 补朱说之未尽、正《集注》之外讹, 强调通《易》以知《论语》, 主张以史证经、通经致用, 自古文学立场出发强调沟通汉宋, 即谓清朝以来汉宋学的发展来看, 算得上正古文学《论语》研究的殿军之作。当然, 有些地方也不免烦琐, 遭人致诘, 马一浮的《论语大义》可以视作民国时期心性义理学派《论语》研究的代表作品。一浮治学取精用宏、大而化之、淹贯儒释、主以义理; 思想上以孔子为教主, 立仁心为本体, 将涵养作工夫, 以释为木, 以儒为学, 以知能合一为方法, 以六艺之学为判教。《论语大义》正是如上体系中的一环。其强调以儒家“六艺”来范围东西学术, 质实而言仍是对作者心性性情、兼该理气的本体思想的呈现。作者以六艺论为架构对《论语》一书进行了新的解释, 此在民国《论语》学史上独树一帜。该书援佛理以说《论语》, 自出机杼, 揉合理学和心学, 借《论语》谈六艺, 以六艺见本体。当然具体来看, 一浮的学术思想及其文字著述方面也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不足, 比如说以仁为理、理代逻辑, 比如说为证己说曲为判释, 比如说圣人情结太重, 比如说文字训解上的牵强, 等等。

程树德《论语集解》可以说是而今最受推重的民国时期的《论语》注本, 作者能在身患重病、生活困顿的情况下坚持治学, 不为贫病所折, 其学问精神令人起敬。《论语集解》体例周密, 资料丰富, 能以一己之力让人望见整个两千余年《论语》学史的烂漫长景, 更能于不少地方有其自家之发明, 又能持以相对公允的态度评判注家得失, 整体而言实属不易。其强调版本校勘、注本和注人考订, 能容摄释道之学, 方法上推重以经解经, 复能以常情解经、生活解经。惟是圣人情结凝重, 对朱子《论语集注》抵斥略过, 有些地方还不免自相抵牾, 稍显不美。不过, 在经学研究厌弃门户、强调公允

、推尚调和的文化背景下,《论语集释》算得上民国《论语》学此一方面的代表。

赵纪彬所著《先秦儒家哲学批判》(建国后改称《论语新探》),是中国学术进入文化发展上的哲学时代后,在20世纪上半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解读《论语》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该书的最大特点即在能主动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同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研究结合起来,借以探讨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并由此向人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论语》研究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具体而言,该书在某些问题的考证上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其关于“君子”、“小人”问题的考证即有其一定的道理,而且在嗣后20世纪下半期的《论语》学史上影响极大。而外,作者所尊尚的具有明显时代气息的统计分析的《论语》研究进路,也很有价值,对后此的《论语》研究有一定影响。不过该书确也存在着理论运用不免机械、具体考证有欠谨严等方面的不足。总之,此一时期的《论语》学在儒门原典失位官学、传统经书角色转型的背景下发生,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包括西学冲击、话语流变等等在内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内容来看对前朝的《论语》之学有明显的继承,更有时代性发展。这一期间,不仅出现了诸如《论语集注补正述疏》、《论语解注合编》、《论语集释》、《论语大义》、《论语疏证》等许多重要注本,更端启了包括系统考索、援手哲学(若《先秦儒家哲学批判》)以及与结合出土文献重新判研(若王国维《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在内的嗣后《论语》研究的新趋向,在整个《论语》学史上有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0906011.aspx

授权使用: 黄山学院学报(qkhsxy), 授权号: a9c65b87-803d-4cfa-b35a-9eb90103ff05

下载时间: 2011年4月2日